

历史
档案

苏联共产党 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赵永穆 臧乐安 范国恩 罗正发 译
赵仲元 校



中国出版社

苏联共产党 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上)

赵永穆 臧乐安 范国恩 罗正发 译
赵仲元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永穆等译校.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7.6

ISBN 7-80088-919-X

I. 苏… II. 赵… III. 苏联共产党-党内斗争-史料 IV. D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534 号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赵永穆 臧乐安 范国恩 罗正发 译
傅也俗 谢梅馨 赵仲元 阎殿铎
赵仲元 校
责任编辑:王前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9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北京市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6 字数 72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册 定价:58.00 元(全二册)

ISBN 7-80088-919-X/D·95

代 序

阎明复

1995年3月，我在莫斯科逗留了两个星期，在俄罗斯历史档案馆里，我偶然发现，《历史档案》杂志中连载了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编者在发表时，为这份材料加了一个标题——《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还有一份材料是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编者加的题目是《尼·谢·赫鲁晓夫是怎样被撤职的？》。这两份苏共中央全会的材料，披露了苏共中央内部斗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过去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一直未能看到原文。如今看到这两份材料，真是喜出望外，有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之感。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苏关系经历了从蜜月到冷战的转折。翻开这段历史，30多年前亲身经历过的那些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出我的脑海……

1957年，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翻译。7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接到苏联驻华使馆罗满宁的电话。他说，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受苏共中央的委托，要求紧

急约见毛泽东主席，有重要事情转告。我当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汇报。过不久，尚昆同志告诉我，毛主席不在北京，委托刘少奇同志接见。我将这一决定转告给了苏联使馆。

少奇同志当天下午在中南海西院官邸的客厅里接见了阿布拉希莫夫及苏联使馆的客人。陪见的中央领导人有彭德怀、王稼祥、杨尚昆等同志。

阿布拉希莫夫对少奇同志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要他向毛泽东同志通报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反党集团的决定》（《决定》全文已收入本书）。阿布拉希莫夫向中央领导同志介绍了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活动”。

参加会见的中央领导同志表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都是老同志，对这样的一些老同志所犯的“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办法处理。我们党内有个王明，他的教条主义给我们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时还是说服代表们选举他作中央委员。

最后，少奇同志说，我将把你转告的情况向毛泽东同志报告。

会见很快就结束了。我很快把谈话内容整理成正式记录，交给了尚昆同志。

事后第二天，尚昆同志通知我，米高扬秘密来华，要去杭州见毛主席，并要我第二天清晨同尚昆同志一起去杭州担任翻译工作。

到了杭州，下午七点半，米高扬、阿布拉希莫夫一行

到汪庄毛主席住地。会见是在靠湖边的一个书房里进行的。房间不大，中间一张长条桌子。主席居中坐下，米高扬和阿布拉希莫夫等苏联客人坐在对面。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等领导同志。我坐在主席身边做翻译，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担任记录。

米高扬开始向毛主席和在座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通报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活动。他谈一段，我译一段。毛主席和周总理偶尔插话或提问一两句。当时的杭州正值七月溽暑，天气闷热异常；书房里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狭小的空间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大家一边听一边擦汗，一边扇扇子。离开北京的那天，我带了一把黑色的新扇子。我一边扇，一边翻译。米高扬讲话的时候，我集中精力记录，就把自己的扇子放在桌面上，翻译完就拿起扇子扇几下。主席用的也是一把黑扇子。他扇几下，放下来停停，过会儿拿起来又扇，没在意把我的扇子拿去了。我也随手拿起一把，回家一看，是把旧扇子。在扇柄的内侧有“毛泽东”三个字，看上去是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上面的。这时我才知道是主席的扇子。这把扇子到现在还珍藏在家里。

中间休息时，米高扬问主席，为什么到这么热的杭州来避暑。主席对他说，我喜欢夏天耐暑，冬天耐寒。到冬天只穿单裤。有时还游泳咧。说完就大笑起来。

会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左右。最后，主席对苏联客人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支持苏共中央这个

《决定》，还让我把政治局的决定翻译给米高扬听。并且表示，接受赫鲁晓夫的邀请，他将于11月初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和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米高扬听了这番话，十分满意，并表示感谢。从他表情上看得出有些激动，似乎心里的千斤重负一下子都卸了下来。

离开汪庄，我陪米高扬回到西子湖畔的别墅。那时已是凌晨三点半钟了，我看他还那样兴致勃勃，通宵的会谈竟没有使他感到有所疲劳。根据安排，第二天我就要陪他返回北京。当时，为了保证米高扬专机的安全，空军司令刘亚楼同志亲自安排飞行计划。他通过主席秘书叶子龙转告我们，徐州地区夏天多雷雨天气，飞机务必要在上午11点以前起飞。我把这一情况告诉米高扬，请他早点休息。他同意了。

米高扬这次到中国来之前，是在黑海边休假。为了争取毛主席、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叫他中断休假来中国。米高扬在海边被海风吹得后背疼，他问我，在走之前能否请中医给他治治。我向叶子龙讲了，叶子龙建议请浙江人民医院的医生给他做做针灸。

翌日，11时许，我和李志绥医生、浙江人民医院的孙振环医生，来到米高扬的住所，他还在睡觉。大家只好等着。

下午1点，米高扬起来，吃过饭后，做了针灸。

针灸是孙振环做的。李志绥只是问了问疼痛情况，我

当翻译，一共没谈几句话。这时快两点了，我陪同米高扬急急忙忙去了机场。

米高扬的专机是伊尔—14，机舱里放了张长条躺椅，中间是小茶几，旁边有几个没有靠背的圆沙发。米高扬躺在睡椅上，我坐在小圆沙发上。起飞不久，天气就变得很坏。乌云滚滚，扑面而来。飞机颠簸得很厉害，连茶几上的热水瓶和水杯子都翻倒了。中国的领航员来报告说，刘亚楼司令从北京的南苑机场和机组对话。亚楼同志曾在苏联留过学。当时我到驾驶舱去，就听见他用流利的俄语大声责怪机组这么晚才起飞，指挥机组向天边亮的方向飞行，绕过雷雨层。于是，我们的飞机先是向西安方向飞行，然后再往北京方面驶去。

任凭飞机怎样颠簸，米高扬却毫不在乎。他对我说，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即使是死也满足了。当时，我心里想，这老家伙真缺德，你活了70多岁了，死了是没关系，我才20几岁，也得赔上。

飞机经过艰难的飞行，终于平安到达北京。原定降在南苑机场，因下起了大暴雨，临时改降在西郊机场。杨尚昆同志从南苑赶到西郊机场前来迎接。

事情过去多年了。最近看到原苏联出版的几本回忆录，才了解到有关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一些细节。

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每天从早上开到深夜，持续了四天。会议一开始马林科夫突然提出免去赫

鲁晓夫领导职务的问题，指控他在经济政策上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更主要的是在揭发斯大林问题上，走得太远，损害了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也损害了整个国际共运的威望。马林科夫等人商定，推选莫洛托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是，赫鲁晓夫坚决否认对他的一切指控。在激烈的争论中，支持赫鲁晓夫的有三名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苏斯洛夫和基里钦科。反对赫鲁晓夫的七名委员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洛夫。主席团候补委员勃列日涅夫、朱可夫、穆希金诺夫、什维尔尼克和福尔采娃则支持赫鲁晓夫，但是，他们没有表决权。主席团候补委员谢皮洛夫开始支持赫鲁晓夫，在持久的争论中最终站到了多数委员一边。最后，主席团打算通过一个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决议，赫鲁晓夫和支持他的人声称，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第一书记的是中央全会，而不是主席团，因此只有中央全会才能免去他的职务。他们要求召开全会，但被主席团拒绝了。在主席团开会期间，国防部长朱可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暗地里把各地的中央委员召集到莫斯科来，要求主席团召开全体会议。主席团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还拒绝会见中央委员的代表。此时，一大批中央委员向主席团送了书面声明，重申了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但是没有回音。这时，中央委员们涌向克里姆林宫，谢罗夫带领一大批中央委员闯进主席团会议大厅。主席团的多数委员决定派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和米高扬出面同中央委员们谈判。然而，赫鲁晓夫也来到大厅。会见一开始，伏罗希洛夫就大骂，而谢罗夫也对骂起来，并威胁说，如果主席团反对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将不征求主席团意见，自行召开全会。这样，主席团被迫同意召开中央全会。

全会从6月22日开始，到29日结束。赫鲁晓夫主持了全会开幕式。在会上，苏斯洛夫作了“关于反党集团的情况介绍”；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洛夫作了检讨。莫洛托夫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承认“反党”。在全会对决议进行表决时只有他一人弃权。此外，伏罗希洛夫也做了检讨发言。全会的决议和简短的新闻报道，一直到7月4日才发表。决议中只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对于其他人也分别做了组织处理，并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

然而，事隔7年，情况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64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夜空的宁静。电话是苏联使馆打来的。契尔沃年科大使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求见毛泽东同志。情形和7年前那一次太相似了。我一看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便马上向尚昆同志作汇报。由于毛主席在战争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白天睡觉，下午三、四点钟起床，然后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所以，尚昆同志每天也都工作到深夜。当时他说，现在这么晚了，中央领导同志大多都休息了，请修权同志见吧。伍修权同志当时在中联部任副部长。经与修权同志联系，由于夜深了，外宾接待室的服务人员都休息了，我建议在

修权同志住处的客厅里会见。商议妥后，伍修权同志就在住处等候，我通知苏联大使半小时后到中联部大门口会合。我收拾一下，立即和司机出发。等我赶到中联部时，苏联大使的车已经先到了。我让我们的车在前带路，直抵院内伍部长住所。

契尔沃年科见到伍修权部长后，首先表示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搅他，因为苏共中央有重要情况，明天就要发表，要求他今天就通知中国方面。接着，契尔沃年科向伍修权同志宣读了苏共中央全会作出的决定。决定说，赫鲁晓夫同志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提出了辞去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10月14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满足了他的请求，并一致推选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提名由柯西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我译完后，伍修权同志沉默了片刻。他感到事情很突然，于是问道，除了通知中讲到的“身体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契尔沃年科说，除了电文之外，其余无可奉告。这样，会见就结束了。

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出乎人们的预料。

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兴奋。送走苏联客人，我径直返回中南海，连夜向尚昆同志汇报。尚昆同志也很兴奋。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叫醒我爱人，把消息告诉了她。因为她当时在中联部工作，也参与过与西欧国家共产党的联络工作，知道内情。大家都很兴奋，久久不

能入睡。我记得当时还对她讲，主席真伟大，评论文章还没有发表完，赫鲁晓夫就下台了。

但是，没想到事隔几年之后，在“文革”开始不久，伍修权深夜接见苏联大使这件事，竟被江青一伙作为他“里通苏修”的一个证据。我是1967年11月被视为苏修特嫌遭监禁的。为此，伍修权专案组的人到秦城监狱来提审我，问了好多个“为什么”，要我老实交代。譬如伍修权为什么深夜会见苏联大使；又为什么在家里会见而不是在机关会客室；中联部那么多俄文翻译，为什么偏偏找你阎明复来作翻译；谈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容……。我听了这些问题，感到又可气，又可笑。可气的是，他们罗织罪名，诬陷忠良的勾当；可笑的是他们的无知和愚蠢。当时，我耐着性子对他们讲述了事情的真实经过，并郑重声明伍修权绝没有里通苏修的事。专案组的人说，你不要大包大揽，你连自己都保不住，还要保伍修权！此事还曾去盘问了我的爱人。当时她也被隔离审查。他们问她，你丈夫是不是苏修特务？她表示，关于他的工作情况我从来没问过，不过，赫鲁晓夫下台那天晚上，他陪伍部长接见之后，回家来十分兴奋，谈了很多。还讲到我们党和主席如何如何伟大。如果是特务，那时他应该感到懊丧才是呀！

毛主席得悉赫鲁晓夫下台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抓住这个时机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派周总理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

过不久，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社会主义国家驻

京使节，我去作翻译。周总理对使节们说，十月革命 47 周年很快就要到来，现在苏共中央选出了新的领导，我们准备派出党政代表团去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也建议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参加。当时在场的阿尔巴尼亚大使表示，他会报告阿党中央，但他相信阿不会派团。对此，总理表示理解。中共中央派出了以周总理为团长、贺龙同志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团员有康生、刘晓、伍修权和乔冠华等。代表团顾问有熊复和吴冷西等。我作为代表团的翻译随团。胡志明同志率越南党政代表团同机前往。

11 月 7 日上午，代表团在红场观礼。当时的莫斯科已经是大雪纷飞的季节了。周总理身着咔叽布中山装，外边是一件灰色呢大衣，穿着单薄。在凛冽的寒风中，一站就是三个多小时。我们非常担心，生怕把他冻病。

这天晚上，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举行盛大酒会。大厅的一端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为主宾桌。苏共中央领导和各国代表团的团长沿长桌站着，围成一圈儿。我陪周总理和贺老总也站在主桌旁。大厅的两边离主桌约十米处，一直到宴会厅的另一端摆了很多餐桌。苏联其他党政军及社会各界的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分别站在这些餐桌旁边。站在主桌左边第一个餐桌旁的是苏军的元帅和将领们。其中有周总理和贺老总都认识的罗科索夫斯基、崔可夫等，大家一边谈，一边进餐。酒会开始半个小时，周总理建议贺龙同志去给苏军的元帅们敬酒叙旧，让我陪贺老总一起去。贺龙同志一过

去，苏军的老朋友们纷纷和他握手、碰杯，十分热情。这时，从大厅的另一边，急急忙忙赶过来一位身着元帅服的人，他就是马林诺夫斯基。贺龙同志原来就认识他。当他走到贺老总身旁时，贺龙同志建议为我们两国军队的友谊干杯。马林诺夫斯基却说：

“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赶走毛泽东！”当时在场的其他几位苏军将领则说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

贺龙同志闻声，怒斥了他的无理挑衅，并马上走向主桌，向总理报告。

周总理当即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苏斯洛夫等苏联领导人提出严正抗议。

勃列日涅夫说，马林诺夫斯基喝醉了。

总理反驳道，酒后吐真言么！要求对方道歉。

酒会一结束，周总理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到我驻苏使馆，连夜给中央起草电文，报告这一事件的经过。为了准确无误地反映情况，周总理把我和当时在场的翻译同志找来，反复核对了事情的经过。直到凌晨3点多，我们才返回别墅休息。

11月8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到中国代表团住所看望周总理时，周总理又向他们追问这件事，坚持要求道歉。他们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他们今天代表苏共中央来正式道歉。周总理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后来，在中苏代表的会谈中，

米高扬又表示，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他们和赫鲁晓夫没有丝毫分歧。同时，在会谈中苏共新领导人仍然坚持赫鲁晓夫在同年7月提出的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主张。周总理指出，你们要召开的是分裂的会议，我们主张召开团结的会议，你们一定要召开，我们绝不参加。实际上你们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这样，中共中央试图缓和同苏共关系的愿望没能实现。

至于对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真实原因，苏共方面始终避而不答。我们对其内幕一直不甚了了。今天，这个未尽话题，在本书编录的第二份材料——《尼·谢·赫鲁晓夫是怎样被撤职的？》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中，可以为我们作个详尽的解答了。

至于废黜赫鲁晓夫的事，从苏联解体后发表的一些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在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之前已经秘密酝酿很长一段时间了。到10月中旬，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在黑海边度假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大多数都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这样，才决定在10月13日召开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中断了休假，返回莫斯科参加会议。在主席团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除米高扬外，主席团其他成员都发言指出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越来越独断专行，滥用权力，作风粗暴，任人唯亲，为所欲为等等，不一而足；指责他在内政外交方面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无休止的徒劳的改组和改革，工业、农业政策的失败，苏伊士运河事件，加勒比海危机，同中国关系的恶化等等。赫鲁晓夫不仅断然否认对

他的所有指控，反而对主席团其他成员提出了许多指责，并声称所有的决定都是主席团集体讨论作出的。在这种一面倒的情势下，米高扬提出免去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而保留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的建议被会议否定了。主席团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仍未结束，只好决定第二天接着开会。看来，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不会像1957年6月全会那样反过来否定主席团会议的决议了。当天深夜，赫鲁晓夫给米高扬打电话说，既然大家都想解除他的职务，他不反对。“他将不再斗争了。”这样，第二天，也就是10月14日下午，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苏斯洛夫作了一个小时的报告后，全会通过了免除赫鲁晓夫一切职务的决议；选举勃列日涅夫为中央第一书记，并提议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这前后两份记录，对前苏联和苏共历史的研究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我们把它翻译出来，以飨读者，也供学者们参考。

译者前言

1991 年底苏联解体后，苏联共产党中央绝密档案开始解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局同《利特》出版社，于 1993 年初联合创办档案史料杂志《历史档案》（双月刊），在创刊号上首次发表 1964 年 10 月苏共中央全会逼迫赫鲁晓夫辞职的会议速记记录；随后，又在 1994 年第 1 至 6 期上连载 1957 年 6 月苏共中央全会清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会议速记记录。该杂志在发表 1957 年 6 月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时，每期均冠以《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的总标题，并在反党二字上括以引号。现将俄联邦《历史档案》杂志发表的上述两次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连同全会做出的有关决议和告全体党员书一并译出，汇集成册，并沿用原杂志所加的总标题作为书名。而将 1964 年 10 月苏共中央全会逼迫赫鲁晓夫辞职的会议速记记录，作为本书附录同时介绍给广大读者。书中除保留原杂志发表时所作的大量简要注释外，我们又增补少量译者注。

鉴于这本苏共档案史略篇幅很长，为便于读者在翻阅本书之前对其内容有个概括了解，现将 1957 年 6 月在